

陶渊明五子年龄及诗人早年仕宦探隐

吴国富

(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 江西九江 332005)

摘要:陶渊明生育了五个儿子,了解这五个儿子在诗人各个阶段的年龄状况,对于了解陶渊明的生平以及一些诗文的系年有重要价值,对探索陶渊明早年的仕宦情况也有重要的提示意义。据分析推论,陶渊明青年时曾在朱序手下为参军,在北方奔走十年,二十九岁始返回南方。

关键词: 陶渊明 五子年龄 早年仕宦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 - 4580(2015)03 - 0007 - (05)

陶渊明一共生育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的名字及年龄排序在陶渊明诗文中确有明确表述。了解这五个儿子在诗人生平活动中的年龄状况,对于了解陶渊明的生平以及一些诗文的系年乃至探究陶渊明享年问题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探究陶渊明早年仕宦的情况而言,诗人成家及最早生子的时间也是一个必须参照的数据。而据分析推论,陶渊明青年时曾在朱序手下为参军,在北方奔走十年,二十九岁始返回南方。

一、五子年龄与陶渊明生平活动之关联

根据陶渊明诗文所叙,陶渊明总共生育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与子俨等疏》:“告俨、俟、份、佚、佟。”指出五个儿子的名字为陶俨、陶俟、陶份、陶佚、陶佟。又《责子》诗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根据此诗,陶俨小名阿舒、陶俟小名阿宣、陶份小名(阿)雍、陶佚小名(阿)端、陶佟小名(阿)通。其中三子陶份、陶佚为孪生兄弟。《和刘柴桑》:“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可知诗人还有一个女儿,名字不详,排行也不详。《责

子》诗的“行志学”用《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典故,指即将到十五岁,定为十四岁基本准确。因此,《责子》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五个儿子之间的年龄间隔:

老大 16 岁,老二 14 岁,老三、老四 13 岁,老五 9 岁。

上述事实,在以前的研究中均已得到揭示。然而,尚未有人综合研究陶渊明诗文中反映的五个儿子的年龄情况,而事实上这对于了解诗人的生平活动、尤其是推测其早年的活动以及推断一些诗文的系年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陶渊明的诗文以及《宋书·陶渊明传》、《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中,有六七处与陶渊明五个儿子的年龄状况有关。如《命子》诗,描述了大儿子陶俨刚刚出生的情景。《归去来兮辞并序》的“幼稚盈室”“稚子候门”“携幼入室”,反映了陶渊明的儿子当时都还是少年儿童。萧统《陶渊明传》描述与《归去来兮辞并序》同时的情况说:“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表明接受书信的儿子尚未成年,难以自给,不过能读懂书信、稍知事理罢了。这个

儿子当然应该是大儿子。《和刘柴桑》云：“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这时诗人的女儿已经出生。《与子俨等疏》云：“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这时诗人还有儿子尚未成年。萧统《陶渊明传》《宋书·陶潜传》均曰：“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这时诗人有两个儿子已经成年，可以抬着父亲出门了。上述词句，都不能准确反映诸子的年龄，但由于诸子的年龄间隔相当确定，故可以通过综合考察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云：“结发念善事，偃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这首诗写于五十四岁（六九之年），“始室丧其偏”，一般的注解均引《礼记·内则》“三十始室”说他三十岁丧妻^[1]。这种解释应当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过分拘泥，因为这两句也可以说他于“弱冠之年”遇上世道艰难，未能及时成家，拖延到三十岁才成家，没过多久（可以是一两年之间）妻子就去世了。此为陶渊明第一任妻子，应当为他生下一个大儿子即陶俨，根据《与子俨等疏》“汝等虽不同生”之语可知。如果第一任妻子生育了几个儿子，那就需要好几年，称为“始室丧其偏”就有些夸张了。而既然生了一个孩子，断为当年结婚、当年生子，就不如断为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生子比较合理。为此得出的结论是：陶渊明30岁结婚，31岁生大儿子陶俨，随后妻子就去世了。一年之后再娶翟氏，其他几个儿子均为后妻翟氏所出。

陶渊明三十岁才成家，随后得子，颇为激动，故《命子》诗曰：“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顾惭华鬓，负影只立。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名汝曰俨”，就是描写生下大儿子陶俨时的情景。由“负影只立”、“无后为急”等词语，可推测陶渊明因为“少而贫苦”、孤身在外“东西游走”了很多年（均见《与子俨等疏》），故而结婚较晚，所以称为“负影只立”。如果成家早，生儿子及时，别人就不会有什么议论，他也不会“无后为大”的焦虑感了。这与“始室丧其偏”的解释是吻合的。“顾惭华鬓”云云，应当是看见老母的满头白发，觉得很惭愧。其时母

亲已经五六十岁，颜延之《陶征士诔》云：“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用“居无仆妾”来形容他青年时孤身一人的情况是合理的，而“母老子幼”也符合他三十多岁时的情况。

《归去来兮辞并序》有“幼稚盈室”、“稚子候门”、“携幼入室”等语。义熙元年，陶渊明出任彭泽令，时年41岁，按照上述推论以及五子年龄的排序，任彭泽令时陶渊明五个儿子已经全部出生，大儿子11岁（虚岁），二儿子9岁，三子、四子8岁，五子4岁。因为三子、四子孪生，做母亲的身体压力较大，其女儿较有可能在五子之后出生。这样诗人就有6个孩子了，称为“幼稚盈室”非常贴切；而“稚子候门”、“携幼入室”也都有了着落。因为大儿子只有11岁，无法胜任柴水耕作之劳，所以陶渊明从彭泽派了个劳力给他，并写了一封信给儿子，其中“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的描述也符合事实。11岁的人粗识得一些文字，略微明白一些事理，致以书信也合乎情理。这一大堆孩子，让陶渊明感到“生生之资，计无所出”也理所当然。

陶渊明《和郭主簿》云：“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呀呀学语的孩童，也就是一两岁之间；如果其中的“弱子”指大儿子，则此诗为陶渊明31、32岁所作；如果其中的“弱子”指第五子，则此诗为陶渊明37、38岁时所作；由此形成了此诗的创作时间上限和下限。

陶渊明写作《与子俨等疏》时“年过五十”，基本上可确定为51岁，如此当年大儿子21岁，二儿子19岁，孪生的三子、四子为18岁，幼子为14岁，与文章中“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的叙述吻合。

刘遗民从辞官到去世的时间，处于陶渊明39—51岁之时。陶渊明《和刘柴桑》云：“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酬刘柴桑》：“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这两首诗应该作于陶渊明辞官之后不久，才比较符合“弱女”、“童弱”的情况。

义熙十四年（418），陶渊明54岁，此时王弘出任江州刺史。萧统《陶渊明传》、《宋书·陶潜传》都说到陶渊明“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按照上述推论，五个儿子此时分别为24、22、21、

21、17岁，这样叫两个年长一点的儿子抬轿子，乃是合情合理的。

宋代陈舜俞撰《庐山记》卷三之《十八贤传》中有小传：“张野字莱民，南阳宛人也，后徙浔阳柴桑。与陶元亮通婚姻。……义熙十四年戊午终。春秋六十九。”与陶渊明结亲，当在张野去世的义熙十四年以前，也就是说在陶渊明长子陶俨24岁以前，二子22岁以前，三子、四子21岁以前；较合理的情况是张野把女儿嫁给陶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推论的基础是传统的陶渊明“享年63岁说”，如果用其他享年来推，则很难说得通。例如根据76岁说，则陶渊明应当生于永和八年（352年），因为诗人于丁卯年即公元427年去世是确定的；如此诗人30岁结婚，时为太元八年（382年），长子陶俨出生于383年，到义熙元年（405年），诗人已经54岁，依据《责子》的年龄排序，五个儿子的年龄分别为：

23、21、20、20、16岁。

这样《归去来兮辞》中的“幼稚盈室”就完全不合事实。

如果陶渊明享年52岁或50岁，则义熙元年（405年）诗人为31岁或29岁，依据《责子》的排序以及31岁生大儿子的时间，五个儿子的年龄分别为：

（1）大儿子刚出生或第二年才出生；其余四个儿子离出生时间尚远。

（2）连大儿子都未出生，更不用说其他孩子了。

这样《归去来兮辞》中的“幼稚盈室”也就全部落空，或者顶多只有一个孩子。

如果陶渊明享年56岁，则义熙元年（405年）诗人为35岁，依据《责子》的排序以及31岁生大儿子的时间，五个儿子的年龄分别为：

5岁、3岁、2岁、2岁、未出生。

这虽然符合“幼稚盈室”的表述，但此时的陶渊明给一个5岁的儿子写信，跟他交代事情，有点让人啼笑皆非。而“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的描述也不贴切，因为儿子根本不能自给。又根据56岁说，到了义熙十四年（418），陶渊明为47岁，依据《责子》的排序以及31岁生大儿子的时间，五个儿子的年龄分别为：

16岁、14岁、13岁（两人）、9岁。

这时诗人教一个16岁的儿子和一个14岁的儿子抬着他出门，也未免不近情理。

二、陶渊明早年仕宦考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基本明确陶渊明三十岁才成家的事实。此前一年，他出任江州祭酒，没多久就回家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陶渊明从二十来岁到二十九岁，是不是一直呆在家中躬耕？”陶渊明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说：“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闲居”而不理“尘事”，或许可以表明他三十岁以前都呆在家中；然而《与子俨等疏》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东西游走”指到了很多地方。又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其中的“当年”应当是指“体力强健、适合劳作的青壮之年”，或可说明当时他对家中的一些田地并不熟悉，这应当是“东西游走”所致。

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说：“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骖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馀。”根据诗人最早成家的时间来看，这首诗应当是对他29岁以前生平的概述。“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指的是“弱龄”以前的情况，也就是说二十来岁以前，他在家中闲居，以耕种读书为事。而“时来苟冥会，骖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是指他遇上一个时机，就暂时告别了田园，登上了仕途，明显这属于第一次出仕。为此，传统的注解把这首诗说成是陶渊明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时在公元404年^[2]，可以说是扞格不通，与诗意出入甚大，有的学者就曾经指出过这一点^[3]。因为在404年之前，陶渊明不但早已担任过江州祭酒，更是在桓玄手下任职甚久，与诗歌描述的初仕情况完全不合。而且，此时的陶渊明已经40岁，诗歌叙事从“弱龄寄事外”一下跳跃到40岁，时间上跨了20年，也显得很别扭。因此，这首诗写的应当就是他青年时第一次出仕的情况。陶渊明《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将军使都经钱溪》：“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是指上次经过这一带距离乙巳年（403年）已经很久，按照前文所述，至少已有十几年。

陶渊明的《杂诗四首》有“遥遥从羈役”“萧条隔天涯”“慷慨思南归”“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泛舟拟董司”“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羈”等语，指的应当是他曾经在北方从军十载，也就是从20岁到29岁这十年；29岁始回南方，起为江州祭酒。十年的北方行踪，在他诗中其实并不少见，如《饮酒》诗说：“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拟古》诗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直至东海隅”就是到了滨海一带。古代的东海，包括今天的黄海，如《太平御览》卷九四七引前秦苻朗《苻子》云：“东海有鰲焉，冠蓬萊而浮游于沧海。”“蓬萊”相传就在胶东半岛附近的海上。“张掖至幽州”，应指因公干曾到张掖、幽州一带。又如《拟古》诗：“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有，非商复非戎。”当指公务之暇到无终（今天津蓟县）的一次旅行。《拟古》诗又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伯牙墓在安徽省固镇县，庄周墓在河南省民权县，均为诗人行旅所见。如果把这些诗句都看成是虚拟之词，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关于陶渊明早年仕宦的问题，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有较好的分析：“陶渊明此年（指二十岁时）开始游宦，以谋生路。沈《传》：‘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与渊明自述对照，可知系指弱冠游宦谋生而言。《饮酒》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即此事。《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回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乃回忆此时之生活。然则渊明任州祭酒之前尝为生活所迫出任低级官吏，详情已不可考。”^[4]所论颇有道理，惟没有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与此事联系起来看，又将二十岁系于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故而难以进一步探究详情。

依据传统的63岁说，在公元383年，时陶渊明虚岁十九。著名的淝水之战爆发，战役以前秦苻坚的军队大败而告终，苻坚的国家因此而陷入混乱，一时间趁火打劫、乘时窃据者所在皆是。当时前秦统治下的不少官员趁机反秦，有的直接自立为王，有的则打着东晋王朝的旗号，东晋将

官亦趁机收复失地，苻坚则于第三年被杀。在这种情况下，是朝廷大量用人之机，也正是有雄心壮志者猎取功名的大好时机，堪称“时来苟冥会”。于是20来岁的陶渊明，就在振兴家族以及“猛志逸四海”的心态中告别了田园，作了镇军参军，并且一直到达东海之滨。

接下来的问题是：陶渊明在谁的手下任职？缘何又到了张掖一带？探究这段时间的东晋历史，陶渊明的初仕与一个人物的关系很密切，那就是朱序。根据《晋书·朱序传》，朱序为义阳人，乃桓温旧党^[5]，兴宁末年，梁州刺史司马勋反，桓温上表推荐朱序为征讨都护以讨之，以功拜鹰扬将军，太和末年为兖州刺史。因襄阳沦陷，朱序被迫作了前秦的尚书。在淝水之战中，朱序趁秦军稍作退却之机，大喊“苻坚败了”，引起秦军全面溃败，因而建立功勋。回到东晋，初为琅琊内史，转扬州豫州五州军事，屯驻洛阳。之后又监兖青二州诸军事，并领二州刺史，经略东海之滨，之后又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诸军事，经略西北边地。可以说，从太元十一年到十八年，朱序掌管着相当于今天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山西、甘肃、四川、重庆这八省一市的军事，疆域辽阔，期间仅为了击退丁零人翟辽、翟钊的进犯，就曾转战数千里。而陶渊明在这期间奔走于东海之滨、幽州乃至甘肃张掖一带（正像《与子俨等疏》所谓的“东西游走”），与朱序的军事经略范围颇为一致，故而极有可能就在朱序幕下担任参军。至于他为何到了张掖一带，很可能与当时前凉王张天锡之子张大豫趁前秦内乱意图复国之事有关。张大豫起兵时，略阳人王穆起兵酒泉以应之；敦煌人索遐则与著名学者郭瑀起兵五千以应王穆。他们愤慨“名教沦于左衽”，起兵亦以此为名，并与东晋联络。又《晋书》载纪第二十二“吕光”：“其将徐灵与张掖太守彭晃谋叛，光遣师讨灵，灵奔晃。晃东结康宁，西通王穆，光议将讨之。”可见王穆起兵也波及到张掖一带。陶渊明可能就因此作为东晋使者被朱序派到了张掖一带，因为这一带的军事活动都在朱序的管辖范围之内。

陶渊明所说的“镇军参军”，可以指“镇军将军的参军”，也可以指“镇军府的参军”，后者就是指“都督某州军事的镇军府”。按《晋书·朱

序传》：“又监兖青二州诸军事、二州刺史，将军如故，进镇彭城。序求镇淮阴，帝许焉。”正是朱序开镇军府的说明。如《太平御览》卷二四八引孙盛《晋阳秋》说“刘裕虚浮镇京口”，晋陵人韦某对刘裕说：“今不希镇军府，闻护军司马缺，愿赐卒恩。”“镇京口”即开“镇军府”于京口，亦可佐证朱序“镇彭城”即开“镇军府”于彭城之意。以朱序这样重要的军事将领，理所当然设有镇军府。逯钦立注解陶渊明《杂诗》之“泛舟拟董司”云：“董司，都督军事者。……据《晋书·安帝纪》，元兴三年，刘裕伐桓玄，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军事，董司当指刘裕。”^[6]“董司”指都督军事者是合理的，惟指为刘裕则未必妥当，当以朱序为是。而以陶渊明家族尤其是其外祖父孟嘉一族与桓温的关系来看，陶渊明在淝水之战之后投身于朱序手下做镇军府参军，的确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也因为朱序是桓温旧党，深受朝廷猜忌，所以陶渊明投身朱序幕下，就难免遭到“不洁去就之迹”之讥，也不容易遇上升迁发迹的机会。太元十八年，朱序去世，时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也就不得不带着一无所成的遗憾返回了南方。综合起来，淝水之战以后，朱序的宦辙所至，也差不多就是陶渊明早年仕宦轨迹所至；而朱序在淝水之战后转战东西至于去世的时间，也大体上就是陶渊明早年仕宦的时间。这种合拍，大大增加了上述推测的可能性。

上述推论，还可以回答另一个问题，亦即《归园田居》五首的创作时间问题。传统注解对诗中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多表示不解，或认为“三十”是虚数，或认为“三十”当为“十三”之误，因为从二十九岁起为江州祭酒到四十一岁辞官归田，头尾刚好十三个年头。逯钦立《陶渊明集》则认为是“十年”之夸词。根据上述推论，这组诗应当是陶渊明于29岁返回南方时所作，“一去三十年”是对出生至于二十九岁之经历的总结。其中“久去山泽游”一首，咏叹田园

丘墟之景，有浓重的隔世之感，也不符合彭泽归来的情境，若说他在北方奔走了十年，则很自然会生出田园丘墟的感叹。而“开荒南野际”、“我土日已广”之类的描述，也暗示他家的田地久乏料理，多半荒芜，这也不是几个月就能出现的景象。

淝水之战以后，桓氏家族的桓冲任江州刺史，两年后去世；继而桓伊担任江州刺史，但就在陶渊明南归之前数年，桓伊迁任护军将军，由王凝之接任江州刺史（约在太元十四年或十五年，王凝之弹劾豫章太守范宁，其时王凝之当已经为江州刺史；太元十六年，江州刺史王凝之组织僧徒在庐山翻译佛经，见《出三藏记集·阿毗昙心经序》）。这意味着朝廷（或扬州势力集团）剥夺了荆州势力集团对江州的掌控权。故而南归后起为江州祭酒的陶渊明，作为桓氏集团的人物，不可能得到任何重用，故而愤然辞职，带着满怀惆怅回家成亲、种田去了。直到五年之后，桓氏集团的桓玄再度掌控江州，担任刺史，他才再一次出仕。

参考文献：

- [1] 逯钦立. 陶渊明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50.
- [2] 逯钦立. 陶渊明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71.
- [3] 参见刘奕、邱爽. 陶渊明做过流域的参军吗[J]. 古典文学知识, 2013(4).
- [4] 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850.
- [5] 参见吕志学. 〈晋书·朱序传〉考述[J]. 青年文学家, 2011(3): 27.
- [6] 逯钦立. 陶渊明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21.

（责任编辑 秦川）